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开发及对跨国经营绩效影响

○黄 健 陈初昇 衣长军

摘 要：从社会网络视角将华侨华人内外部网络特征作为研究出发点，基于扎根理论方法，首先从成长性、融入性、联通性、传承性四个维度构念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通过对 225 名华侨华人和当地族裔发放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初步验证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构念效度；然后发放 379 份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验证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结构维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研究结果显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在四维度构念最优；最后，通过对 155 家中国海外子公司发放问卷，进一步研究验证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了量表的预测有效性。

关键词：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扎根理论；量表开发；动态能力；海外子公司绩效

作者简介：黄健，华侨大学社会科学处副研究员，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工商管理、国际投资（E-mail: hj2006@hqu.edu.cn；福建 泉州 362021）。陈初昇，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商务与华商管理。衣长军，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投融资与国际企业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广度、深度与效率影响研究”（22AGL004）

中图分类号：C912，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4）01-0041-18

DOI:10.16067/j.cnki.35-1049/c.20231213.00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 2021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2.79 万亿美元，连续五年排名全球前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已成为跨国公司获得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海外扩张的重要战略。据 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中国跨国企业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约 4.6 万家，分布在全球近 190 个国家（地区）。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的国家（区域）看，在亚洲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超过 2.7 万家，占 59.2%；在北美设立的境外企业约 6 000 家，占 12.9%；在欧洲设立的境外企业约 4 500 家，占 10%。全球海外华侨华人约有 6 000 万，分布于全球 200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华侨华人约 4 400 万，北美约 685 万，欧洲约 300 万。通过对这两类区域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其在华侨华人网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东南亚华侨华人网络规模更大、经济实力更强、影响力更深，而欧美等地区则弱化很多。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海外子公司绩效表现在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异^①，母国和东道国的宏微观环境

收稿日期：2023-06-21

^① 王碧瑀、衷子雅：《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表现及其差异分析》，《经济管理》2021 年第 1 期，第 72—88 页。

是影响海外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从制度距离、文化距离等多个角度对海外子公司绩效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但鲜有学者关注到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在海外子公司运营中的作用。为此,本文从海外子公司绩效表现差异视角出发,讨论华侨华人网络在中国海外子公司生产运营中的作用和影响机制。

制度理论认为,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组织,必然受到东道国制度影响,常常面临“外来者劣势”和投资合法性等问题^①。东道国制度、文化不同于母国环境,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市场国家,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来源国劣势”更为严重,因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贸易保护主义,我国海外子公司在资源、信息和技术获取方面困难重重。然而,以“中华文明”和“五缘关系”为纽带的华侨华人网络具有民族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征,为我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新的助力。华侨华人经过长时间在东道国经营,具有较为雄厚的资产及社会资本,可以为中国海外子公司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帮助中国海外子公司获得合法性支持,实现更好地发展。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华侨华人积极在东道国参政议政,政治话语权逐渐增强,在东道国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②,当中国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开展经营时,拥有更强政治话语权的华侨华人网络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搭建更广阔的政策沟通互动平台,发挥联通作用。基于此,进一步将社会资本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引入研究框架中,从华侨华人网络在东道国的联通广度和深度,以及双重文化认知优势等网络特性视角进行剖析,探讨华侨华人网络影响海外子公司绩效机制。

一 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海外侨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华侨华人整体经济科技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增强,融入东道国主流社会加深,国际化、网络化趋势增强,为此,围绕华侨华人的研究也逐步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点。

(一) 社会网络概念及其发展

社会网络定义最早由 Mitchell 提出,也被称为关系,是指一群特定人之间的所有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物质环境和文化共享而结成的间接的社会关系^③。目前的文献对社会网络的理解大致有两种视角。一是将社会网络视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内在特性,它是人与人之间相对稳定的关联体系,并能够共享信息和资源。Bourdieu 将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联系起来^④,Coleman 首次正式提出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且有获取信息的能力^⑤。二是在社会学领域产生的社会网络分析法。它是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方法,是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Moreno 提出的社会测量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用来分析行动者彼此间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⑥。社会网络分析主要存在两个领域,一是以 Freeman 为代表,采用社会

① Luo Xueming, Bhattacharya Chitra Bhanu. The debate over doing good: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rketing levers, and firm - idiosyncratic risk.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9, 73 (6), pp. 198 - 213.

② 方长平、侯捷:《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136—152页+158页。

③ Mitchell James Clyde.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analyse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④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6, pp. 241 - 258.

⑤ Coleman James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pp: 95 - 120.

⑥ Moreno Jacob Levy. Who shall survive?: A new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human interrelations. *Washington, DC: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 1934.

计量学传统，进行社会心理学的小群体研究。二是以 White、Granovetter、Lin、Burt 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社会学，以网络作为社会结构，观察社会网络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网络理论研究的重点包括行动者的重要性、行动者之间纽带或关系的紧密程度、具体内容和结构特征等^①。

近年来，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网络的多维度特征与质量属性及其影响。张辉华提出社会关系网络体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②。广度指网络成员间的关系类型和对外联系的规模。深度主要指网络成员间内部关系的联系强度、发展程度。刘琦等认为知识共享网络质量包括增强人们交换知识的深度和广度^③。为此，社会网络质量可以包含网络成员对外联系的广度与对内联系强度或深度两部分。胡新华等指出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创业者社会网络的规模特征与结构特征，对社会网络的质量属性关注不足。高质量的社会网络能为创业者提供更多优质资源，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④。

（二）华侨华人网络概念及其测量

1. 华侨华人网络概念

华侨华人网络概念源于海外移民，但相关国际贸易文献对于海外移民和华侨华人网络这两者的用法并没有严格区分^⑤。严格意义上华侨华人网络指中国与东道国两个国家之间移民建立的互动关系。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中西社会结构进行对比后，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即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的，表明了自己与他人的亲疏远近，往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成为了中国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一^⑥。在国际经济交流领域，华侨华人网络是中国（母国）与东道国之间重要的沟通纽带，是以共同的种族、信仰或地缘关系作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⑦。为此，在国内外华侨华人方面的相关文献，也通常使用“华商网络”“华侨华人网络”一词来描述移居海外的华人与中国大陆之间种种联系^⑧。

2. 华侨华人网络的测量方式

现有研究对华侨华人网络的测量方法，主要采用二手数据方法来衡量。

第一种方法是采用东道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来衡量中国海外移民网络强度。蒙英华等利用东道国华人移民数据，发现海外移民网络能提升中国出口企业数量，但对每个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没有显著影响^⑨。顾露露等同样采用东道国中国移民数量的对数值数据，发现东道国海外移民网络能显著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⑩。蒙英华等采用 2000 年东道国移民存量数据，提出移民网络通过“移民偏好”“信息成本”与“进口替代”三种机制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⑪。

① 郭云南、张晋华、黄夏岚：《社会网络的概念、测度及其影响：一个文献综述》，《浙江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第 122—160 页。

② 张辉华：《个体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社会网络的视角》，《心理学报》2014 年第 11 期，第 1691—1703 页。

③ 刘琦、杜荣：《基于参与动机的网络社区知识共享质量、创新及满意度关系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 年第 3 期，第 56—61 页。

④ 胡新华、喻毅、韩炜：《谁更能建构高质量的社会网络？——创业者先前经验影响社会网络构建的作用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2020 年第 5 期，第 126—138 页。

⑤ Bastos Paulo, Silva Joana. Networks, firms, an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7 (2), pp. 352 - 364.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观察社，1947。

⑦ 陈卓武：《海外华商网络在广东“走出去”战略中的功能与作用》，《东南亚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90—92 页 + 96 页。

⑧ Rauch James E., Trindade Vitor.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s*, 2002, 84 (1), pp. 116 - 130.

⑨ 蒙英华、蔡宏波、黄建忠：《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研究》，《管理世界》2015 年第 10 期，第 54—64 页。

⑩ 顾露露、陆伟桢、陈漪澜：《移民网络是否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 期，第 69—86 页。

⑪ 蒙英华、赵倩玉：《异质性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产品效应研究》，《财贸研究》2022 年第 8 期，第 32—47 页。

第二种方法是采用东道国华人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数据来体现华侨华人网络强度和联系频率^①。李凝等用东道国华裔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来测量东道国华人网络的活动强度,并采用2003—2011年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样本,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东道国与中国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②。衣长军等同样采用各国华裔人口占当地人口的比例来表示海外移民网络活动强度,实证发现东道国移民网络活动强度能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在该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③。

第三种方法用中国移民人数占东道国总移民人数的比例与当年中国总移民人数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乘积来测度华侨华人网络在中国海外移民网络中的地位^④。吴小节等采用该方法,发现中国企业投资到制度顺差的东道国时,更倾向于通过华商网络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⑤。杨连星等同样沿用Rauch等的测度方法,实证检验了海外移民网络能通过降低双边价值观差异、减弱贸易摩擦,从而显著提升中国跨国并购绩效^⑥。

(三) 文献述评

文献回顾表明,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对外商贸及投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对华侨华人网络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华侨华人网络的规模特征,而对于网络的结构特征和质量属性关注不足。华侨华人网络的质量属性包括关系的强度、稳定性、传承性等方面,这些属性对华侨华人网络的实际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其次,华侨华人网络的定义尚未界定清晰,内涵阐释不足,外延尚未展开,缺少系统地整体空间网络角度探索其结构维度及生成过程。大多数学者根据研究内容,选择符合研究情景的表述。再次,华侨华人网络测量方法中,学者大多选择移民数量或华侨华人数量占比作为替代变量来衡量华侨华人网络,研究受到局限,主要体现在:一是移民数据的获取与各国海关统计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公布相关,一些国家会存在移民数据缺失,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二是移民数据获取时间跨度较大(5年或10年),数据存在滞后现象,无法建立动态面板数据。三是关联性不够,不管是移民数据还是华侨华人数量占比,数据不是为特定研究主体定制,在使用二手数据时,不能很好地控制变量,较难达到研究目的。为此,有必要提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概念并加以验证。近年来,已有学者关注到移民网络质量的重要性,如蒙英华,赵倩玉的研究表明高技能移民网络的贸易促进作用逐渐递增;与之相反,低技能移民网络的作用则伴随产品质量的提升不断下降。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OFDI的深度参与,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作用会更为突显。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网络关系的程度。本研究认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能反映华侨华人群体内、外部联系的深度与广度,体现华侨华人网络的影响力。从中华文化特征与社会网络宏观视角出发,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应包括华侨华人网络成员间的对内连接强度和稳定性、对外连接广度与深度及中华文化传播程度等。

① Gao Ting.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inward FDI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3, 14 (4), pp. 611 - 629.

② 李凝、胡日东:《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东道国华人网络的调节效应》,《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93—100页。

③ 衣长军、刘晓丹、陈初昇:《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97—107页+136页。

④ Ahuja K. K., Simons E. G., Rimington M. R., Nair S., Gill A., Evbuomwan I., Bowen - Simpkins P. One hundred and three concurrent IVF successes for donors and recipients who shared eggs: ethical and practical benefits of egg sharing to society. *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Online*, 2000, 1 (3), pp. 101 - 105.

⑤ 吴小节、马美婷、汪秀琼:《制度差异方向、关系网络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管理工程学报》2022年,第1—16页。

⑥ 杨连星、马一诺、王秋硕:《海外移民网络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45—160页+191页。

(四) 研究创新点

一是将华侨华人内外部网络特征作为研究出发点,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建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构念,探索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结构维度,剖析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内涵、特征及其应用,拓展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边界。二是通过开发出来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验证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了量表的预测有效性,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提供了概念模型及测量工具,拓展了华侨华人网络研究的范畴,对今后开展华侨华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二 基于扎根理论探究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构念

质性研究强调通过对所收集经验材料进行细致、系统分析来具体探究社会现象、开发新构念或补充完善现有理论的一种方法。借鉴扎根理论对访谈华侨华人获得的一手经验材料进行质性分析,通过对13个国家华侨华人访谈资料的反复推敲、归纳总结,寻找华侨华人内外部网络质量的概念维度,推理演绎这些范畴概念之间的关联,为后续进行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应用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一) 理论抽样与资料获取

质性研究中的抽样要围绕研究目的、研究者所具备的条件、样本与研究者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考虑华侨华人规模、行业类型、区域聚集性等,选取不同区域、年龄不同跨度、行业类型差异作为访谈对象。最终选取印尼、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西班牙、泰国、博茨瓦纳、阿根廷、美国、马来西亚、斐济等13个国家的华侨华人进行访谈,华侨华人工作领域涉及教育、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物流等行业。

资料获取主要来源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中的质性材料,来自出版书籍(如华侨华人蓝皮书、世界华商报告等)、网络公开资料(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站、中国侨联网站、中国新闻社、一带一路网等)。二是对华侨华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首先,根据所获取材料分析结果及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围绕以华侨华人网络特征、在东道国的合法性、社会网络关系为核心的网络质量构念,编写了包含13个问题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例如:您所在国家,华侨华人之间平时联系频繁吗?华侨华人网络在当地的资源和影响力如何?等等)。其次,针对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开展深度访谈。主要是针对访谈中出现的问题或疑惑,与受访者核实访谈内容,确保资料整理的准确性。最后,结合官方媒体公开资料,对访谈资料进行三角验证,识别个别不真实内容并予以剔除。最终,访谈13个国家29名华侨华人和5名留学生(外籍),其中男性22名,女性12名,年龄分布主要在23~60岁。受访者平均访谈时间为30~40分钟左右。整个访谈过程大致经历一个半月,访谈时间总计为1200分钟左右,经转录、整理后的文字共计3万余字。为确保原始质性材料的全面与有效,我们系统地审查了所有材料,并邀请在扎根理论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经验专家进行分析,最终共获取11余万字资料库,为三级编码开展提供基础。

(二) 编码过程

1. 开放式编码。开放式编码主要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解、反复比较,不断概念化和范畴化。在此过程中,考虑华侨华人所处语言环境及可能对中文表达的不习惯性,为了保证华侨华人表达的准确意思,我们尽量使用原生代码。编码过程中,根据自然涌现原则,采用“逐段编码”“逐行编码”“逐句编码”方式进行。最终,从34例华侨华人访谈取样中提取了458个初始概念。限于篇幅,本文的开放性编码过程,只选取了1位访谈实例,对开放性编码过程进行了部分

展示。

如斜体字所示,以受访者 A2 为例:

受访者 A2 的原始文本资料开放性编码清单: A2-1,地域性很强的华人社会,该条目来源于“西班牙华人社会属于地域性很强的华人社会,目前在华人群体构成中,青田华侨华人仍然占了60%以上”; A2-2,华人社会属于“熟人社会”,该条目来源于“因为第一代、第二代华侨居多,因此华人社会还是属于“熟人社会””; A2-3,联系比较频繁,该条目源于“相互之间的联系还是比较频繁的”;。。。。。。A2-24 支持孩子学习中文,该条目源于“她们都比较支持孩子学习中文”。

通过对以上原始文本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研究由受访者 A2 所提供的原始文本资料获取了24个初始概念(A1-A24,中间部分因篇幅限制省略)。

2. 选择性编码。完成开放性编码后,就需要对提取处理的初始概念进行选择性的编码。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就是筛选初始概念,提取核心范畴。核心范畴是在开放性编码中自然涌现的。通过比较初始概念,从数据中萃取出与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相关联的核心概念。对开放性编码中所提取的458个初始概念进行筛选、合并、分类,将关联度较高和出现频次较高的34个子范畴进一步的分类、合并成4个核心范畴,根据归属到不同核心范畴的子范畴所蕴含的概念内涵,将这4个核心范畴分别命名为“联通性、融入性、成长性、传承性”,完成选择性编码工作,最终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选择性编码结果

核心范畴	子范畴	初始概念(选取了部分)
	1. 地缘性社团组织	A1-3 将不同地域的人群联系在一起 A2-1 地域性很强的华人社会
	2. 广泛联系当地社会	A1-6 活动范围比较广泛 A7-10 丰富多类型
	3. 内部联系紧密	A1-9 联系非常频繁 A2-3 联系比较频繁
	4. 内部凝聚力强	A1-10 不同社团成员间相互支持 A2-4 比较团结
	5. 参政议政	A1-16 华人后代参政的人数逐渐增多 A1-15 影响局势
联通性	6. 与当地政府建立联系	A1-36 与各政府部门建立联系 A2-6 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
	7. 从事各行各业工作	A1-26 各行各业都有华人的身影 A7-12 在当地经商的情况也会有 A7-18 自己做生意
	8. 开放包容态度	A1-33 对文化不断加深了解 A1-34 认知度加深
	9. 文化包容性	A2-20 遵守当地法律 A1-38 认可及尊重当地文化
	10. 资源丰富	A3-14 我个人看资源还是丰富多类型的 A6-10 各行各业都有资源

融入性	11. 具备社会影响力	A7-11 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 A2-8 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影响很大	
	12. 具备商业影响力	A1-17 商业影响力比较巨大 A2-16 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13. 社会责任	A1-18 组织救灾 A1-20 组织协助安排疫苗接种 A1-21 抗疫贡献巨大	
	14. 公益美德行为	A17-6 无私奉献, 服务侨胞 A16-10 华侨华人十分友善, 很友好, 具有慈悲之心	
	15. 吃苦耐劳	A2-10 吃苦耐劳, 与世无争 A2-14 且大部分华侨华人勤劳肯吃苦	
	16. 乐善助人	A1-40 参与所在国民生建设 A7-15 进行慈善捐款活动	
	17. 融入当地民众	A1-19 与当地民众交往是最深的 A2-9 关系总体上还是好的 A2-12 与当地民众的联系还是比较多的	
	18. 得到尊重和肯定	A1-42 对华人华侨的评价还是可以的 A7-29 友好和亲切	
	19. 融入主流社会	A2-19 加强和主流社会的联系 A2-21 融入主流社会	
	20. 建设和谐社会	A2-17 当地政府对华人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改观 A7-13 比较融洽 A7-14 比较友好	
	成长性	21. 适应更新	A24-11 与主流社会也开始了无缝结合 A16-12 积极调整策略, 努力适应每一天的新变化
		22. 主动学习	A6-10 主动参加线下学习 A20-9 相互切磋、借鉴与学习
		23. 注重中文语言学习	A1-45 将子女送到本地那些中文水平高的华校 A1-45 能保留中文的学习
		24. 注重综合素质提升	A1-37 加强自身的学习 A7-27 提高个人实力以及知识层面,
		25. 注重专业学习	A5-10 深入学习 STEM 知识, 掌握核心技术本领 A6-11 不断学习新技能
		26. 发展潜力大	A7-23 发展还是比较有前景 A2-15 发展势头确实是不错的
	传承性	27. 文化认同	A1-44 对于中华文化还是感兴趣 A7-32 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都比较多
		28. 文化传承	A15-16 帮助青少年理论祖(籍)国文化背景 A24-11 父母很重视子女学中文
		29. 保留传统习俗	A17-10 都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习俗 A23-16 在婚丧嫁娶等方面都继承了中国的传统习惯
		30. 故土情怀	A21-17 大盼望早日“衣锦还乡” A21-18 华侨华人意识里死后也希望葬于故土, 表示魂归故里, 落叶归根之意。
31. 文化宣传		A22-18 社团经常推广中华传统文化 A24-15 回来后, 经常与当地小朋友分享在中国的经历	
32. 与中国各级政府交往		A7-20 对中国的往来沟通还是比较密切 A1-28 与中国各级政府交流频繁	
33. 与祖(籍)国保持紧密联系		A1-29 与中国的亲朋好友往来 A1-30 往返菲中的航班很多	
34. 提升对祖(籍)国认同感		A7-33 不断延续的发展传统文化 A7-34 提高她们对中国的认同度	

3. 理论性编码。理论性编码过程主要确认核心范畴的合理性。根据经典扎根理论研究程序,通过对4个核心范畴不断比较,并与现有文献进行比较: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形成的思想、概念和范畴全部包含在核心范畴内,因此无需再次进行新数据的补充。最终构建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概念模型。联通性、融入性、成长性、传承性这4个核心范畴共同构成了一个中心范畴,即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文献比较和验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文献比较和验证

核心范畴	子范畴	文献比较和验证
联通性	1. 地缘性社团组织	潘宏立等(2019),陈秋梅(2017)
	2. 广泛联系当地社会	中国特色
	3. 内部联系紧密	陈佩琳(2020),Jati(2021)
	4. 内部凝聚力强	龙登高(1998),姜永兴(1989),Deffa(2016)
	5. 参政议政	李佳佳和曾少聪(2023),赵璧(2022),向大有(2021)
	6. 与当地政府建立联系	崔守军和张政(2018),Biao(2006)
	7. 从事各行各业工作	刘月琴(2013)
	8. 开放包容态度	林逢春(2013),Ragazzi(2014)
	9. 文化包容性	张淑瑛(2012)
	10. 资源丰富	刘芳彬(2022)
融入性	11. 具备社会影响力	林少红(2018),Brinkerhoff(2008)
	12. 具备商业影响力	张春旺(2023),覃馥琳(2019),Bhachu(2005)
	13. 社会责任	刘雨辰(2021),Graham(2014)
	14. 公益美德行为	赵健和赵炜怡(2022),张梦颖(2019),Duara(2003)Wang and Chitty(2021)
	15. 勤劳善良	李忠壹(2018)
	16. 乐善助人	中国特色
	17. 融入当地民众	林少红(2018),Kumar and Steenkamp(2013)
	18. 得到尊重和肯定	李安山(2005)
	19. 融入主流社会	张秀明(2023),包含丽和夏培根(2022)
	20. 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
成长性	21. 适应更新	陈奕平和王岚(2022),Tecun and Tongan(2017)
	22. 主动学习	包含丽和夏培根(2022),Hua(2010)
	23. 注重中文语言学习	余媛媛和杨萍(2021)
	24. 注重综合素质提升	王艳(2018)
	25. 注重专业学习	王冠兴和柯世池(2017),Lieberman(2009)
	26. 发展潜力大	陈奕平和关亦佳(2022),张颖(2018),Scheyvens(2007)
传承性	27. 文化认同	陈鸿超和杨祥银(2022),马峰(2022),Charney et al.(2003)
	28. 文化传承	陈奕平(2023),Wei(2020),余媛媛(2021)
	29. 保留传统习俗	陈列(1987),Archer et al.(2010)
	30. 故土情怀	中国特色
	31. 文化宣传	苏瑞浓(2021),Wang,(2020)
	32. 与中国各级政府交往	中国特色
	33. 与祖(籍)国保持紧密联系	邱小鹏(2018)
	34. 提升对祖(籍)国认同感	徐敏和刘林华(2022)

(三)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定义及内涵分析

根据扎根访谈结果,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定义为根植于中华文化向心力的华侨华人,保持着与祖(籍)国的友好交流和往来,并在东道国建立起内部强连接和可持续发展,外部受当地政府和民众支持、具备良好声誉的四维高质量网络。其中,联通性表示华侨华人之间联系紧密,能形成信息流,对于不同文化具有开放与包容的态度,且与当地社会和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融入性表示华侨华人能够为当地带来的社会、商业等影响力，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遵守行为规范，获得当地政府和民众信任；成长性表示华侨华人注重核心能力建设，具有主动学习意愿、适应更新发展能力，塑造可持续发展动能；传承性主要表示华侨华人心理上对故土的眷念、对祖（籍）国文化的认同，并且从行动上始终保留与祖（籍）国亲人和故友的密切来往，传承故乡的风俗习惯，主动传播中华文化。

三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开发与信效度检验

（一）量表开发

基于扎根理论开发了4维度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编制出23条测量条目作为初始量表。为确保初始量表的内容效度，邀请了一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家、一名企业管理领域专家和一名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专家对23条题测进行定性评估。同时，根据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内涵，精炼语言，形成修订版量表。为确保量表条目的实践有效性，邀请东南亚、澳洲、欧洲、美洲二十几名华侨华人采用李克特五点的方法评估每一条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题项表达是否清晰、是否存在异议。最终回收20名评定结果，结果显示，2条实践条目（a. 华侨华人经营的企业或集团在当地有认可度；b. 华侨华人能够影响行业标准的制定）存在争议（均值<3）。在与专家商议后，对该题项进行了修订，确定无异议后形成包含21题项的预试量表。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1. 数据收集。用李克特五点问卷收集数据，数据来源分为三部分：第一，在校华侨华人学生；第二，通过来华留学生以滚雪球方式向其家人朋友发放；第三，通过海外各类社团组织发放。最终回收电子问卷265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224份有效问卷。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样本特征值

类别	内容	频率	百分比
身份	华侨华人	166	74.1
	非华侨华人	58	25.9
年龄	24岁以下	46	20.5
	25岁-40岁	119	53.1
	41岁-50岁	25	11.2
	51岁-60岁	24	10.7
	61岁以上	10	4.5
性别	男	123	54.9
	女	101	45.1
学历	博士	8	3.6
	硕士	32	14.3
	本科	154	68.8
	专科及以下	30	13.4
居住年限	1年以内	6	2.7
	1-3年	9	4.0
	4-6年	9	4.0
	7-9年	12	5.4
	10年以上	188	83.9
行业	制造业	40	17.9
	通讯、互联网	14	6.3

行业	交通、物流	24	10.7
	旅游、餐饮	15	6.1
	金融、咨询服务	10	4.5
	贸易	92	41.1
	教育行业	14	6.3
	政府部门	2	0.9
	社团组织、非盈利机构	6	2.7
	其他行业	7	3.1

2. 预试量表题项筛选与保留。采用可靠性分析和项目鉴别度分析检验量表题项的信度和鉴别度。量表整体 Cronbach's Alpha 为 0.930, 表明信度可靠; 每个题项删除后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小于 0.930, 表明各个题项均可靠, 因此保留所有题项。根据项目鉴别度分析方法, 将 21 道题项总分前 27% 设定为高分组, 后 27% 设定为低分组, 结果显示, 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p < 0.001$), 说明量表题项鉴别度良好。

3. 分析结果。采用 SPSS23.0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量表 KMO 值为 $0.915 > 0.8$, 且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根据 Floyd 等的建议和删题标准^①,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最大方差法旋转进行分析, 剔除 7 个题项, 并经多次因子分析, 最终得到 14 道题项 4 个因子, 解释总体变异量为 64.255%, 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 0.6-0.8, 满足标准(见表 4)。维度依次命名为: 成长性、联通性、融入性、传承性。

表 4 探索性分析结果

	成分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12. 华侨华人努力掌握新知识	.857			
13. 华侨华人不断学习新技能	.785			
14. 华侨华人不断进步	.819			
15. 华侨华人努力适应新变化	.858			
1. 华侨华人与当地政府、各类商业、行业协会广泛联系		.751		
2. 华侨华人经常为其成员传递信息和知识		.767		
3. 华侨华人经常为其成员之间的联系牵线搭桥		.793		
4. 华侨华人经常为其成员提供其他的合作关系		.757		
17. 当地民众对华侨华人很友善			.773	
18. 当地民众认可华侨华人是负责的群体			.774	
19. 当地民众对华侨华人很信任			.859	
8. 华侨华人注重与中国的商贸往来				.810
9. 华侨华人注重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809
10. 华侨华人社团注重与中国各级政府组织的友好往来				.730
特征值	8.881	2.165	1.283	1.164
解释变量%	42.291	10.307	6.112	5.545
累计解释变量%	42.291	52.598	58.710	64.255

(三) 验证性因素分析

1. 数据收集。探索性分析不能对最终因子结构的总体拟合优度进行量化, 需要重新抽取样本,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第二次收集问卷, 回收 368 份, 剔除无效问卷后, 有效问卷

^① Floyd, F. J., Widaman, K. F. Factor Analysi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finement of Clinical Assessment Instrument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5, 7 (3), pp. 286-299.

为 325 份。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5。

表 5 样本特征值

类别	内容	频率	百分比
身份	华侨华人	208	64.00
	非华侨华人	117	36.00
年龄	24 岁以下	21	6.46
	25 岁 ~ 40 岁	212	65.23
	41 岁 ~ 50 岁	84	25.85
	51 岁 ~ 60 岁	6	1.85
	61 岁以上	2	0.60
性别	男	165	50.80
	女	160	49.20
学历	博士	2	0.62
	硕士	25	7.69
	本科	213	65.54
	专科及以下	85	26.15
居住年限	一年以内	23	7.08
	1 ~ 3 年	20	6.15
	4 ~ 6 年	14	4.31
	7 ~ 9 年	14	4.31
	10 年以上	254	78.15
行业	制造业	35	10.77
	通讯、互联网	4	1.23
	交通、物流	30	9.23
	旅游、餐饮	11	3.38
	金融、咨询服务	8	2.46
	贸易	169	52.00
	教育行业	36	11.08
	政府部门	6	1.85
	社团组织、非盈利机构	18	5.54
	其他行业	8	2.46

2. 过程与结果分析。采用 Mplus8 软件对 14 个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同时设置备选模型：M1 为单因子模型；M2 将联通性、传承性设置一个因子，成长性、融入性设置一个因子为一阶二因子模型；M3 将成长性、融入性设置一个因子，联通性和传承性各为一个因子设置为三因子模型；M4 为一阶四因子模型，包括联通性、成长性、传承性、融入性四因子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一阶四因子模型（M4）拟合度最优（ $\chi^2/df = 2.215$ ，RMSEA = 0.056，CFI = 0.978，TLI = 0.972，SRMR = 0.034），各项指标均满足标准，四因子模型得到验证（见表 6）。

表 6 验证性分析拟合指标

模型	Chi - Square (df)	Chi - Square/df	RMSEA	CFI	TLI	SRMR
M1	1210.795 (77)	15.72	0.197	0.704	0.650	0.094
M2	908.111 (76)	11.949	0.169	0.786	0.743	0.095
M3	534.615 (74)	7.225	0.128	0.881	0.854	0.076
M4	157.296 (71)	2.215	0.056	0.978	0.972	0.034

3. 信度与效度检验。（1）信度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和组合信度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量表整体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28，联通性、传承性、成长性、融入性的信度依次为

0.884、0.853、0.928、0.874 说明量表整体及各维度信度良好。组合信度结果显示(见表7)各维度组合信度均大于0.8,说明内部一致性较高,量表信度通过检验。(2)聚合效度。根据 Fornell 和 Larcker (1981)^① 等的方法,计算 AVE 值检验量表的聚合效度,AVE 越大表明抽取的变异量越大、测量误差越小,表明潜变量构念的解释变异量大于测量误差对构念的解释变异量。结果显示(见表7)四个因子的 AVE 依次为 0.657、0.636、0.763、0.698,均大于临界值(0.5)。(3)区分效度。进一步计算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发现其值在(0.529~0.592)之间,相关系数值的平方在(0.28~0.35)之间,均小于各因子间的 AVE 值,说明测量项目与因子间的共同变异大于因子之间的共同变异,即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见表8)。

表7 M3 最优模型的综合信度和平均变异量分析结果

维度	联通性	传承性	成长性	融入性
CR	0.884	0.853	0.928	0.874
AVE	0.657	0.636	0.763	0.698

表8 相关矩阵与信效度

	联通性	传承性	成长性	融入性
联通性	0.657			
传承性	.529**	0.636		
成长性	.554**	.592**	0.763	
融入性	.544**	.509**	.556**	0.698

四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影响

(一) 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广泛应用到经济学、管理学等研究领域。Loury 发现社会资本是存在于基于信任、合作等建立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源结构,是个体发展的资源^②。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 首次系统阐释“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构成的关系网络获取一定的资源与信息集合体^③。此后,学者根据社会资本的功能视角(Coleman、Portes、边燕杰等)、网络结构视角(Burt、Lin、周小虎)、信任视角(Nahapiet、Fukuyama、Putnam、郑知邦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断拓展社会资本研究边界。Massey 发现移民在原地或迁入目的地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对移民的迁移决策、迁移后新生活的适应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社会资本理论逐步运用到移民研究领域^④。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多年积累形成社会资本。缺乏所有权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过程中,需要面临更多的外来者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外子公司借助华侨华人网络的社会资本,发挥企业动态能力,以获取生产、经营等有效信息,整合海外子公司内外部资源,帮助企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壁垒,从而提高海外子公司绩效。

① FornellClaes, Larcker Davi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 (1), pp. 39 - 50.

② Loury Glenn C.,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Discussion paper*, 1976.

③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6, pp. 241 - 258.

④ Massey Douglas 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immigr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0, 510 (1), pp. 60 - 72.

1.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海外子公司的经济绩效

华侨华人网络是全球移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研究主要从移民网络视角分析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Gao 以 1990 年的海外华人数据，通过研究 1984—1997 年 68 个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证明海外华商网络能够通过克服非正式壁垒，对促进 FDI 流入中国起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①。张建红运用直接投资强度来衡量 45 个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发现投资国的华裔人口是吸引该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②。21 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学界开始关注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吴群峰基于全球 195 个国家的华人分布数据和对中国对全球 132 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数据，检验了中国企业在华人分布的密集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③。杨亚平研究表明海外华人网络的活跃度能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华人华侨组织，建立东道国海外华人华侨关系网络与海外直接投资联结机制 OFDI，推动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新发展^④。衣长军选用 2003—2013 年中国企业面板数据，考察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双边伙伴关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华人网络关系越发达，越有助于 OFDI 活动^⑤。黄健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制度、知识及华侨华人网络嵌入度等多重前因条件探讨影响海外子公司创新绩效的协同效应，并得出这 3 类条件构成了海外子公司高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⑥。

综合学者们观点及前文分析结论，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华侨华人网络作为海外子公司的重要社会资本，其网络质量特征突显，华侨华人传承性、融入性、成长性及联通性对于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1：

H1：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正向影响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

2. 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动态能力概念由 Teece^⑦ 首次提出，强调动态能力关注企业如何通过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整合生成新能力，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

首先，海外子公司进入东道国面临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华侨华人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可以帮助海外子公司更快地熟悉东道国的国情商情，优先创造和获取各种资源和机会，降低东道国社会与中国海外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⑧，从而使海外子公司能在东道国取得更好地成长。部分学者从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维度分析网络嵌入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发现企业网

① Gao Ting.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inward FDI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3, 14 (4), pp. 611 - 629.

② 张建红：《投资国特征及其对华投资强度的研究》，《世界经济》2004 年第 1 期，第 16—22 页。

③ 吴群峰、蒋为：《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财经研究》2015 年第 12 期，第 95—106 页。

④ 杨亚平、高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选择—制度距离与海外华人网络的视角》，2017 年第 4 期，第 41—52 页。

⑤ 衣长军、徐雪玉：《海外华人网络、双边伙伴关系与中国 OFDI 空间格局》，《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第 116—125 页。

⑥ 黄健、余杰等：《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创新绩效驱动机制—QCA 方法的组态分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第 77—90 页。

⑦ Teece, D. J., Pisano, G. and Shuen, A., 1997,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8 (7), pp. 509 - 533.

⑧ Ma Yechi, FuZheng, JiangWeixian, LiuYuhong, WangZilong. The Impact of China's Overseas Emigration Network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22, pp. 1 - 12.

络中的关系强度(杜健和周超^①, Alinaghian^②等)、结构洞数量和中心度(苏昕等^③)与动态能力正相关。赵英男等^④指出在企业国际化营销中,要利用华侨华人网络,进行信息收集、资源获取,缩短进入市场距离,提升企业生存绩效。扮演互联互通角色的华侨华人网络在东道国企业与中国海外子公司合作中充当代理人和服务者,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对动态能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次,动态能力强的企业可以快速顺应环境变化,进行资源重构,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实现良好企业绩效^⑤。动态能力对于组织跨国经营和绩效具有重要价值^⑥,可以建立新的资源或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⑦。Winter验证了动态能力与绩效和生存能力之间存在直接联系^⑧。肖鹏等研究指出企业面临复杂的国际市场应提升自身协调整合能力、资源重构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⑨,董保宝等认为在学习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应根据外部市场的变迁和内部环境的变化,通过不断学习来构建与外部环境相匹配的动态能力,强化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提升企业绩效^⑩。

最后,从动态能力中介机制研究视角看,尚航标等^⑪研究指出,企业嵌入海外网络并通过动态能力中介变量,可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并实现技术追赶。苏汝劼等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中跨国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动态能力在企业国际化程度与财务优势和市场优势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⑫。熊名宁等指出文化多样性会通过动态能力机制提升跨国企业经营绩效,使得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⑬。李钧基于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动态能力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⑭。

本研究认为中国跨国公司能够利用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整合内外部资源,构建核心竞争力,进而提高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2:

H2: 企业动态能力在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与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当中起中介作用。

- ① 杜健、周超:《母国网络关系嵌入性与企业跨国动态能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年第4期,第43—55页。
- ② Alinaghian L, Kim Y, Srari J. A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on dynamic capabilities: A grounded investigation of buyer-supplier routine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20, 85, pp. 110-125.
- ③ 苏昕、张辉、周升师:《结构嵌入、动态能力与组织绩效:一个混合模型》,《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年第10期,第99—107页。
- ④ 赵英男、方琪、兰春玉:《基于华人网络的中国企业国际营销研究》,《中国市场》2015年第16期,第150—152页。
- ⑤ FAINSHMIDT S, WENGER L, PEZESHKAN A, et al. When do dynamic capabilities lead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fit.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9 (4), pp: 758-787.
- ⑥ 吴航、陈劲:《新兴经济国家企业国际化模式影响创新绩效机制——动态能力理论视角》,《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8期,第1262-1270页。
- ⑦ Teece, D. J. A Dynamic Capabilities-Based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4, 45 (1), pp: 8-37.
- ⑧ Winter, S. G., 2003, "Understan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4 (10), pp. 991-995.
- ⑨ 肖鹏、王爱梅、刘金培:《企业国际化与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年第11期,第85—91页。
- ⑩ 董保宝、葛宝山、王侃:《资源整合过程、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机理与路径》,《管理世界》2011年第3期,第92—101页。
- ⑪ 尚航标、田国双、黄培伦:《海外网络嵌入、合作能力、知识获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5年第8期,第130—137页。
- ⑫ 苏汝劼、常宇豪:《经济新常态下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基于动态能力的视角》,《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第136—147页。
- ⑬ 熊名宁、汪涛:《文化多样性会影响跨国企业的经营绩效吗?——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视角》,《经济管理》2020年第6期,第61—78页。
- ⑭ 李钧:《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学术论坛》2022年第3期,第48—59页。

(二) 研究方法

1. 问卷设计与发放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采用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所开发的量表，由4个维度即“联通性、传承性、成长性、融入性”构成，共包含14个条目。企业动态能力借鉴 (Pavlou, P. A. & El Sawy O. A. 2011)^① 的研究，采用4个条目如“贵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贵公司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力”“贵公司的学习能力”“贵公司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等。经济绩效借鉴 Liu 等^②的研究，共4个条目如“在过去的一年里（或者自贵公司成立以来），贵公司收入增加（例如销售产品或服务）”“贵公司公司盈余水平提升”“贵公司参与更多的商业活动（包括销售和采购）”“贵公司与同行组织相比，竞争力高于平均水平”等。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样本数据。通过省直有关部门及工商联等渠道，向部分国企、民企的海外子公司发放问卷，回收178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55份。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9。

表9 描述性统计

类别	内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18	76.1
	女	37	23.9
学历	博士	7	4.5
	硕士	50	32.3
	本科	73	47.1
	专科及以下	25	16.1
公司职位	高管	66	42.6
	中层管理人员	61	18.7
	基层人员	28	18.1
工作年限	3年以下	29	18.7
	4~6年	50	32.3
	7~10年	33	21.3
	11年以上	43	27.7
子公司成立时间	1~3年	25	16.1
	4~6年	27	17.4
	7~10年	29	18.7
	11~15年	26	16.8
	16年以上	48	31
子公司规模	500万以下	47	30.3
	501万~2000万	22	14.2
	2001万~1亿元	27	17.4
	1.1亿元~10亿元	32	20.6
	10.1亿元以上	27	17.4
所在行业	制造业	17	11
	建筑基础设施建设	52	33.5
	资源开发	3	1.9

① Pavlou, P. A. & ElSawy O. A. . “Understanding the Elusive Black Box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Decision Sciences*, 2011, Vol. 42 (1), pp. 239 - 273

② Liu, Gordon, TakedaSachiko, KoWai-Wai.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social enterprise performanc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4, 43 (3), pp. 480 - 501.

所在行业	通讯、计算机互联网	7	4.5
	交通物流	8	5.2
	旅游餐饮	8	5.2
	金融服务	5	3.2
	贸易	21	13.5
	机械制造	10	6.5
	教育医疗	14	9
	其他行业	10	6.5
子公司性质	独资企业	111	71.6
	合资企业	44	28.4
中国母公司性质	民营企业	75	48.4
	国有企业	64	41.3
	集体企业	3	1.9
	其他	13	8.4

2. 分析与结果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量表 $KMO = 0.845$,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在 0.001 水平上显著性, 说明该模型的原始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次, 各变量信度检验显示, 华人华侨网络质量整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5, 4 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联通性 0.817、传承性 0.785、成长性 0.850、融入性 0.847, 均高于 0.7, 说明内部一致性较高, 量表信度通过检验。企业动态能力量表的信度 α 值为 0.871。企业经济绩效量表的信度 α 值为 0.863。最后, 效度分析结果显示 (见表 10), 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在 0.6 以上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AVE 值均大于 0.5, CR 值也均大于 0.8, 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此外, 各变量的 AVE 值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 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见表 10)。

表 10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及信度和效度检验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动态能力	经济绩效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0.753	0.387**	0.462**
动态能力	0.387**	0.786	0.503**
经济绩效	0.462**	0.503**	0.798
Cronbach' α	0.885	0.871	0.863
AVE	0.5675	0.6174	0.6371
CR	0.9479	0.865	0.8748

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可能存在异质性, 对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及经济绩效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组间平方和 12.356, 显著性小于 0.05) 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 经济绩效 (组间平方和 35.744, 显著性小于 0.05) 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 (见表 11)。

表 11 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组间	12.356	46	.269	1.486	.049
	组内	19.517	108	.181		
	总计	31.873	154			
经济绩效	组间	35.744	46	.777	1.966	.002
	组内	42.681	108	.395		
	总计	78.425	154			

采用 SPSS 23.0 和插件 process 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在控制了样本人口统计学变量及公司基本情况后，回归结果见表 12，由模型 2 可知，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与企业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 ($\beta = 0.472, p < 0.001$)，假设 1 得到支持。

表 12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经济绩效的回归结果

类别	经济绩效			动态能力		经济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472***		.408***		.324***	
动态能力					.499***	.364***	
性别	-.004	-.018	.013	-.083	-.010	-.018	
学历	-.057	-.061	-.080	-.121	-.017	-.031	
工作年限	-.117	-.133	-.107	-.012	-.063	-.089	
公司成立时间	-.022	.051	-.074	.241	.015	.055	
公司资产规模	.057	.094	.208**	.037**	-.047	.007	
所在行业	.043	.039	.040	.003	.023	.026	
子公司性质	.086	.089	.001	-.139	.086	.088	
母公司性质	-.080	-.104	-.118	-.083*	-.021	-.054	

注：*、*** 分别表示 $p < 0.05$ 、 $p < 0.001$ ，下同。

模型 4 显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与企业动态能力显著正相关 ($\beta = 0.408, p < 0.001$)。模型 5 显示企业动态能力与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 ($\beta = 0.499, p < 0.001$)。模型 6 显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与企业动态能力和经济绩效回归系数均显著正相关。采用插件 process 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 95% 置信区间下，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企业经济绩效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 LLCI 和 ULCI 均不包含 0，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见表 13）。企业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假设 2 得到支持。

表 1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中介路径的作用			直接效应		
			Effect	LLCI	ULCI	Effect	LLCI	ULCI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	动态能力	经济绩效	.149	.0716	.247	.323	.198	.727

五 结论与讨论

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建构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构念，明确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定义，并归纳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由联通性、融入性、成长性、传承性四个维度构成。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初始量表，以及包含 14 道题项的正式量表，一系列检验结果显示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此外，在量表实证应用中发现，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可以显著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经济绩效，企业的动态能力在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验证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的预测有效性，表明该量表具有实践意义和推广性。

（一）理论意义

1. 明确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内涵及结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诠释了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海外侨胞的新内涵。与华侨华人研究相比，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从中华文化特征与社会网络宏观视角出发，将华侨华人网络内部连接强度与外部连接广度相结合，构建了联通性、融入性、成长性、传承性等四个维度系统化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综合而言，本研究突破了以往以华侨华人规模或者使用代理变量衡量华侨华人网络的单维视角，丰富了华侨华人网络的内涵。

2. 开发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并检验。从社会网络的宏观视角开发了包含四维度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该量表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量化、可操作的有效测量工具,对开展华侨华人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3. 关于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的影响,现有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影响机制较为模糊。本研究通过构建以企业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

(二) 实践启示

1. 高质量华侨华人网络建设。多维度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测量体系表明,提高海外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需要重视所在国内部组织能力和外部社会关系建设,逐步形成经济基础厚、政治影响力强、市场影响力大,对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增强,并加以传承的高质量华侨华人网络。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应加强内部管理,建设和谐侨社;关注新侨发展,发扬老侨对新侨的“传帮带”作用;主动融入所在国建设发展、参政议政,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2.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作为本国族裔关系网络的延续,是中国海外子公司的一种特殊“关系资产”。海外子公司应重视与华侨华人的联系与交流,合理运用华侨华人网络,获取经营所需信息、技术资源,更快地适应东道国环境和熟悉当地的法规制度,克服“外来者劣势”,降低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贸易的风险。同时,海外子公司应增强公司内部治理,提升组织学习能力,有效整合资源,增强企业动态能力,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经营策略,以实现公司持续经营。

3. 对政府部门制定“走出去”战略,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提供政策依据。党的二十大以来,多次强调“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更好地发挥华侨华人网络独特优势”等,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内涵及四个维度为开展侨务工作提供重要的着力点,也为政府制定企业对外投资相关政策提供指引。一是政府应加强海外华侨华人网络的建设,通过建立“华侨华人洽谈会”“华侨华人商协会协作机制”等关系网络模式,构建海外华商交流平台,增强与华侨华人的互动交流,拓展我国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关系网络。二是通过建设数字化平台,加强信息流管理,及时更新发布企业对外投资政策。三是继续开拓学习资源,发挥各级侨联组织作用,分层分类举办研修班,以中国实践引导华侨华人转换视角、拓宽视野,多样性提升华侨华人内生动力。

(三) 不足与展望

第一,本文选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进行访谈及问卷发放,样本代表性可能存在不足。全球华侨华人有6000多万,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华侨华人网络可能存在差异,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行为,可能对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构思的信度产生影响。未来可考虑增加定性分析软件,弥补扎根理论方法应用的不足;第二,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特点差异,可能会带来建构维度的不同。未来可按照国家和地区,展开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比较研究,检验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差异化程度;第三,本文初步探索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结构维度,较为粗略,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检验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特定主题研究中与前因变量、后变量之间的关系机制。

(下转第103页)

**The “Dual Carbon” Talents Training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Data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ff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ZHAO Yuan, PAN Tian-yi, ZHANG Jian

Abstract: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are significant components of the overall layou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a group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alent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lated to energy and environment, and analyze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their staff.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dual carb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wer level employees, reflected in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selec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In terms of talent cultivation for "dual carbon",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mechanisms, improve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s, build interdisciplinary majors, and build a high-level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to achieve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among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ual carbon" talent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ff; “dual carbon”; global governance; talent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龚桂明】

(上接第 58 页)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Quality: Scale Development and its Impact
on Multinational Business Performance**

HUANG Jian, CHEN Chu-sheng, YI Chang-ju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tak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networks of overseas Chinese as the research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s the network quality of overseas Chinese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growth, integration, connectivity and inheritance based on the rooted theory. An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25 overseas Chinese and local ethnic group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was conducted to preliminarily verify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network quality among overseas Chinese; Then,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as conducted through 379 questionnaires to verify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convergent validity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he network quality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twork quality of overseas Chinese is the best in four dimensions. Finally,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55 Chinese overseas subsidiaries, further research confirmed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qual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overseas subsidiaries, verifi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dynamic capability, and tested the predictive validity of the scale.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quality; rooted theory; scale development; dynamic capability;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责任编辑: 龚桂明 林舒琪】